春风般的呼唤

□王振纲

时下，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称呼“师傅”“老板”“先生”“小姐”很是时兴。党内原先互称“同志”，现在这种称呼久违了，尊称官衔却较为盛行。然而，当你迈进中央党校的大门，不管你走到哪里，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同志！”“老张！”“老李！”这样的称呼。这声音像拂面而来的春风那样清爽，像山间的清泉那样甘洌，让人听了觉得亲切、舒畅、入耳，感到人和人之间一下子心贴得近了，感情融洽了。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从部队转业到中央党校时，好长时间都不习惯。在部队叫惯了“师长”“政委”等官衔（部队应该称呼官衔），乍一改嘴还真挺别扭。看着那些须发皆白，额头刻满年轮的长者和比自己大十五六岁的领导，称呼“同志”，总觉得对人家不怎么尊重，总也张不开嘴。记得来党校上班一个多月时，一次，我在电话里叫了一声“主任”，结果被“尅儿”了两句：“咱们党校的老传统互相称呼‘同志’，不兴叫职务。慢慢改着点啊。”虽然挨了“批评”，可我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我想，要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有些领导你不称呼他职务，他心里就不舒服，脸上就不高兴，甚至还会对你耿耿于怀呢。

在党校，确实很少听到“书记”“局长”“主任”这类称谓，一般也看不出领导与部属之间森严的等级，没有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也没有低人一等的仰人鼻息。这里的每个人，从校长、教师到服务员，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每一位来这里参加轮训、培训的学员，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年龄长幼，都自觉实行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从工作到学习、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的“三个转变”，都是普通党员、普通学员。大家志同道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工作的实践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拢到一起，学习理论，寻求真理，寻找开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金钥匙。同窗学习，研究交流，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探讨问题，讲究民主，坚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义”。大家互相争论，畅所欲言，犹如百花竞放。日常生活中，大家互相关心，彼此照顾。每个学员都像学生一样，认真地严格要求自己，像战士一样努力锻炼自己。前些年，学员们自己提起暖壶到开水房打水，拿起抹布打扫各自的房间。每逢周末，同学们还扛起铁锹、扫帚，到划定的卫生区把楼前楼后打扫得干干净净。

“同志！”听着这亲切的呼唤，看着这些普通一兵，我不禁思绪万千。眼前幻化出了延河岸边清凉山上的巍巍宝塔，仿佛看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挥动镢头和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一起开荒种地的热火朝天场面，耳边似乎听到了周恩来同志和大家一起摇动纺车纺线线的悦耳声音。这就是真正的“同志”啊！它是无数颗火热的心的息息相通，是对崇高理想、信仰的共同笃守、追求，是为实现远大目标同心戮力的一致奋斗。“同志”这两个字，字字千钧，它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称呼。叫一声“同志”很容易，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人真正做到同“志”，却不简单，这里面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涵啊！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全党上下一心，携手并肩，同德同“志”。

“同志！”多么的亲切，多么的入耳啊！这情，在亲切的呼唤中交融；这爱，在无限的信任中传递；这力，在深刻的理解中凝聚。愿这春风般的呼唤永远回荡在耳畔，永远回荡在我们的校园，永远回荡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离退休干部局）

纪念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

“治理”背后的深意

□赵迎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亮点之一就是“治理”一词的鲜明提出和频繁出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水平”“治理方式”“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一系列与治理有关的概念在三中全会当中被反复提及，这在党中央的历次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当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谈到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时，总是习惯使用管理一词，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等。“治理”的提出，无疑是对“管理”这一传统表述的实质性演进。从“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变，但却有着深刻内涵。

从政治学角度看，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活动。而治理则是指公共权威为维持秩序、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管理和治理，目标职能基本一致，但是主体、理念、方式、路径等却有着重大差别。相比管理，治理是一种更加“优化、良性、多元化、多角度的管理”，是对管理的提升和跨越。

“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大飞跃，由建设传统管理型政府向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使命和功能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全体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然而一直以来，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国威治传统源远流长，政府管得太多，控得太严，缺乏服务理念和守夜意识，结果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得不少，越位现象严重，导致市场失灵、监管缺位，行政权力泛滥，侵权事件频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回归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变管理为服务、变控权为放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仅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融合西方先进理念，借鉴当代治理理论，提出“治理”一词，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深刻转型，打造服务型政府、建设自治型社会成为全党上下的普遍共识和政府建设的根本目标。

“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由注重控制转到注重规范，由依赖行政命令转到依赖制度规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没有遵循按制度规则办事的思路，却在各个领域形成了按行政命令办事的惯例，使得重政策轻制度，重管控轻协调的观念异常盛行，从而导致我国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众所周知，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制度规则都不可或缺，它对于规范个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起着基础性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规范化制定、程序化运行、法制化保障的各种制度，是实现有效管理和自主治理的重要保证和关键指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经历了从制度空白到制度初创再到制度完备的过程。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初步建成并日臻完善，制度自信得到充分确立，依靠制度治国理政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据统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当中有 44 次提到制度，是提及最多的三个词之一。“治理”是一种更为先进、更高层次的管理，它重视制度规则却不仅仅依赖制度规则，而是强调在规则体系的基础上唤醒民众的参与意识，调动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社会协同和整体互动。跟过去的简单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提法不同，“治理”强调各个主体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包容互信、合作共赢。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不仅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而且有利于我们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

“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执政路径的重要转折，由政府管控式向全民参与式转变，由单主体、单向度、单渠道向多主体、多向度、多渠道转变。传统管理方式中，管理主体是单一的，只能是具有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机关及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他个人和机构被排除在管理之外。权力运行向度和运行渠道也是单一的，只能自上而下，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现代治理方式中，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政府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公共机构以及个人等都是主体。权力运行向度和运行渠道则是上下互动，既有政府的计划、组织、控制，也有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参与、推动、协调。总之，治理者既要管理，同时也要被管理，而且首先要对自己进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协商治理、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政法部）

社会纵横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梳理和阐释

——读刘毅强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孙要良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力的主体，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转化为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曲折征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胜利，党的事业就发展；什么时候背离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遭挫折，党的事业就受损失。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历史复兴的中国梦。为此，今年 4 月 19 号，中央政治局决定，从下半年开始分两批自上而下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刘毅强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 月版）是一部较系统梳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力作，也是一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好读本。概括起来，该书主要有三大优点：第一，历史感强，文献掌握丰富。作者在论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时，总是从老祖宗那里谈起，一直到当下，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观点和看法。关于经典作家的论述，作者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体现了很高的学术素养。该书许多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正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充分掌握上。第二，现实感强，密切联系实际。该书没有停留于从文本到文本，而是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之后，将落脚点放在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上，提出“中国梦”是人民群众的追求和理想，“中国梦”虽然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实现它需要党和人民群众同舟共济。这样就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群众路线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了，使理论最后落了地。三是哲学味足，理论分析透彻。该书作者长期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在干部班教学长期讲授《矛盾论》《实践论》，有很深的哲学造诣，这使他在分析问题时没有简单地沦为一般性的政策性解读和宣传，而是提出和分析了很多关于党和国家发展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该书文风朴实、语言生动、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唯物史观就是群众史观，群众路线涉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体现了政治立场与领导方法的统一、认识功能与利益表达的统一；党的群众路线的成熟在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方法的有机统一；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没有群众观点就没有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具体的、历史的，群众路线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调查研究是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桥梁，是纠正党风的有效措施，是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得力办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动摇，等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

书 评

“实事求是”源起考

□刘学江 张连春

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思想精髓，已为世人所共知。但“实事求是”这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河北省献县起源与发祥，却鲜为人知。

一、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记载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于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这一点古今学者及现行辞书均无异议。然而引用者往往只采撷其中只言片语，难免造成后人无法全面了解整体语境，更难以准确把握其深层次含义。为此，在这里将其出处全文录入下来。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

综观全文，我们不难看出，班固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八字，概括评价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其着眼点主要是针对献王的学术活动、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这也是成语“实事求是”的最早出处。唐颜师古对“实事求是”注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可以说是相当精确的。“实”，原意为“草木之实”，转义为充实、真实。引申为查实、证实、落实等义。事，即事情、事项、事物，当时主要是指搜集整理古典书籍这件事。“实事”就是把事情做实，弄清楚。“是”，就是“真”，典籍之“真本”，传承之“真相”，文章之“真义”。“求”，就是探索、研究、求证。实事求是，就是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探求其真相与真义。

二、献王整理典籍的历史影响

西汉时期，以献王为统领的文化抢救活动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图书整理活动，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构建与大一统国家体制相匹配的大一统的价值观体系，已经提到最高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日程上。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提倡以忠孝为本的儒学。受到景帝言传身教的影响，刘德对儒学情有独钟，并同当地大儒董仲舒进行了深入交流。武帝继位，力排众议，果断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学说定于一尊，确立其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献王刘德身体力行，全力以赴，全面参与并领导了这场文化抢救运动。刘德举一国之力，倾阖家之财，用以购求古籍，并且对献书人采取非常谦恭的态度。精神慰藉加上物质奖励，打动了天下人，使图书抢救整理工作大大超出了河间藩国的地域范围，日华宫二十四区，房数百间，住满了四方来的知识精英。献王与儒生们夜以继日，整理残简，补订遗篇，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研究中心。在这里，《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左氏春秋》《考工记》《乐经》等均被先后发现、整理成书，先秦典籍的主要部分被保存下来。在这场大规模的文化抢救文献整理运动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许多竹木简牍藏于山洞、枯井、夹墙之中，风吹水浸，鼠啮虫蚀，缺枝少叶，漫漶不清之处甚多，靠腹诵口传的今文抄本存在许多错讹甚至曲解之处。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典籍整理活动，成为一个极为严肃的现实命题。许多人惮于劳苦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献王则不辞烦劳，舍易就难，采取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后世对献王搜集整理古籍的贡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陶渊明说，“其名德者唯献王”；张继说，“汉室宗亲独称贤”；乾隆皇帝说，“最心许者是斯人”。这充分反映了后人对献王的爱戴和景仰。而大史学家班固和司马光更是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献王挽救儒家文化的千秋功业。司马光在浩叹“微献王六艺其



张晓光 摄

遂殪乎？”之后，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将献王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做了比较：“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废而献王最长，响若遵大义、属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无神仙祠祀之烦，宫室游观之费，穷兵黩武之劳，赋役转输之敝。宜其仁丰义洽，风移俗变，焕然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文景远矣。”乾隆作为一位少数民族的皇帝，竟先后写下咏叹献王的诗达二十余首。他说：“献王好古事求是，大雅千秋祀不群。”又说：“求是端非漫取誉。”这是对献王实事求是治学思想的高度评价，可谓高人一筹，慧眼独具。

献王不仅是一个学风高尚的儒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并且身体力行的政治家。他通过对汤、尧、舜、禹、管仲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提出了以圣王之道“爱民”“教民”“利民”“富民”的为政思想，当国二十六年，一贯“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及鳏寡”，树立了千古贤王的形象。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这次文化抢救运动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是使以儒学典籍为主的先秦旧书得以存亡继绝，重见天日，使中华文明得以成为人类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存续和发展提供了文化灵魂和精神血液。二是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文化发掘和抢救运动，为儒家文化定位为正统思想提供了文化依托，使“以仁为本”“以德治国”和“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三是献王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不仅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而且逐渐流布到社会层面，衍生出“一是一，二是二，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民俗涵义，并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成为重要的思想财富。

三、实事求是的嬗变与升华

明清以来，王阳明、阮元等学术大家提出“实事求是之学”“实事求是之教”的理念，献王被尊为“翼圣”。1914 年，赵天麟校长为天津北洋大学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1917 年宾步程在将湖南公立工业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时，也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赵、宾都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从事工科教学的教育家，他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已超出经学、训诂学领域，具有“在实践基础上探求科学真理”的意义，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

1916 年至 1919 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很自然，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的校训，也深深刻印在了毛泽东的心灵中。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辩证唯物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使实事求是这一古老词汇发生了质的升华，具有了哲学的意蕴，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求真求实这个层次上，毛泽东与献王刘德是一脉相承的，但毛泽东将表示事实的“实事”提高到“客观实在”这一更为广阔的哲学范畴，赋予表示“真相”的“是”以事物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的哲学内涵，达到了空前的思想理论高度。

（作者刘学江系河北省献县县委书记，张连春系献县原文化局局长）

文史天地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 88 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